

#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节选本）

作者：[陆南泉](#)

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 101 个重要问题，相当于 101 场专家讲座，值得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原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荣誉会长阎明复和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前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凤林作序推荐。

阎明复为《苏联真相》写的序

由于工作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一直十分关注苏联问题。1991 年年底苏联解体后，我国国内的学者撰写了不少论著，对苏联 70 年的历史、它的兴衰、中苏关系与最后解体原因等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看法，应该说，取得了不少进展。我对研究这些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特别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继续探索，研究苏联问题，总结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的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 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纵观全书内容，我认为，本书的重要意义首先是有利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大道。党的十七大在总结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与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它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战略思想。从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发展道路来看，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又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发展模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什么是中国特色，我认为，正如书中提出的，首先是不学苏联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这已被中国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所证明。

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客观的评析，指出它在苏联建国初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思想僵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适时的改革，使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

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本书还用了较多的篇幅研究斯大林之后各个时期改革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最后失败的原因。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虽取得一些进展，理论上亦有所进步，但并没有改变行政指令为基本特点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用地方的行政指令代替中央的行政指令。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头几年还坚持推行改革，后来就停滞不前，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一词也不准用了，只能用“完善”一词。所以，改革的停滞，导致苏联社会经济的停滞。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一方面他看到对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紧迫性，着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另一方面改革又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后来又失去了控制，最后迷失了方向，改革的失败，加速了苏联剧变的进程。从本书对这三个时期的概括性分析可以看到，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确实像小平同志讲的只能是死路一条。但同时，改革又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要与时代发展的潮流、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和本国的实际相适应。

本书的写作形式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它把大量的人们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集中起来（其中不少问题是过去与现在、国内与国外存在不同看法的问题），以问题解答的方式加以论述，这便于广大读者十分方便地找到自己关心的或长期迷惑不解的问题的答案。

特别要指出的是，参加本书撰稿的作者，绝大多数是长期乃至一辈子从事苏联问题研究的学者。他们十分熟悉苏联的情况，手头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学风严谨，这保证了本书的学术水平。我深信，本书值得重视与阅读，读它可以引起我们对苏联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给人以启发。这对于推动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进一步深入是大有益处的。有鉴于此，我也就欣然提笔，写些想法，作为本书之序，亦是权作向读者作一推荐。

（阎明复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政部副部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现任中华慈善总会会荣誉会长。）

李凤林为《苏联真相》写的序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作，在苏联和俄国学习和工作前后长达20多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苏联之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苏联人的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双方爆发

了激烈的大论战，在激烈的对抗情绪下都对对方有许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之时，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但是，苏联却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脱危机，叶利钦执政时期使许多人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共和国、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会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年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赶上1996年俄罗斯大选。这次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轮大选中他并没有当选，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诺夫。按照事情的逻辑，既然叶利钦让人们生活更困难，人们应该让俄共重新掌权。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304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74年。在这74年中，苏联曾打败了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各个民族共和国都有了自已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的国家在20世纪发生了三次大饥荒(1921年、1932-1933年和1946-1947年)，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人祸。1907-1913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45%，1963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食的净进口国，到70年代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食品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了衰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长。为什么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却长期无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中苏关系、

李凤林为《苏联真相》写的序(2)

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苏联模式及其历史作用进行的研究，指出了这一模式存在的许多弊端，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对我国在改革开放中

突破苏联模式起了不小的作用。现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织撰写的《苏联真相 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厦在 1991 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对 20 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 世纪是在苏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发生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在此，我想利用为本书作序的机会，就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思考与看法。

首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研究的问题。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后，苏俄实践过两种社会主义模式，一个是军事共产主义，一个是新经济政策。二者的实质区别在于：从并不符合当时俄国实际的理论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列宁从军事共产主义失败的实践中认识到，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满足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需要，用农民熟悉的方法，为此，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共产党员要学做“文明的商人”。不幸的是，列宁早逝，俄共（布）大多数领导人还沉浸在左倾激进情绪之中，幻想很快建成按国家计划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于是，在 1929 年实现了“大转变”，重新回到了军事共产主义的老路上去，消灭了个体农民和私有制，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践表明，这种背离国情、不顾民众利益、冷冰冰的社会主义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苏联的危机实际上是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危机，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苏共的信心。应该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曾取得很大成就，在消灭失业、发展社会福利、实现免费教育等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是，从总体上看，苏联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只停留在纸面上，理论与实践的巨大反差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体制，仍然是争论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围绕今后的改革一直进行深入讨论，也出现了来自不同方面否定改革的声音，有人竟不顾历史事实，去竭力颂扬、美化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体制模式看成是社会主义唯一正确的模式，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拉入苏联模式的轨道。原本已经清楚的问题，又变得模糊起来，有些问题又被颠倒是非，误导国人。例如，至今仍有些人说，斯大林模式是“假命题”，谁提这个就是“制造混乱”、“包藏祸心”、“别有用心”与“无稽和无知”。实际上稍懂点儿苏联历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斯大林模式的存在。斯大林实行的不受

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实际上是他一个人的专政），搞大清洗，滥杀无辜，有人把其原因归结为斯大林“在工作作风方面不够民主，甚至作风粗暴”。至今还有人说《九评》对斯大林的评价是最科学的，他们竭力颂扬斯大林，俄罗斯一有关于赞扬斯大林的书籍和文章，他们就迅速予以宣传报道，甚至进行夸大，否定一切非斯大林化的合理性。一些人不顾俄罗斯人为了重振大国的需要为斯大林强国主义歌功颂德的现实，片面断言“在俄罗斯境内和原苏联范围，从政府到百姓，从老人到青年，从过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时代的优秀人物，都经过反思而对斯大林充满了敬仰，以掀起重新评价斯大林的高潮。”俄罗斯已经在“还斯大林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本来面目。”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意在表明俄国人都在赞扬斯大林，中国人也不应该批评斯大林的体制。这样做的结果，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只能起到阻碍深化改革、干扰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步伐。有文章说得好：“任意地或是处心积虑地美化旧体制和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死路的苏联模式，这样做，如果是不谙世事的青年，就说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对年轻的一代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何等紧要，如果不是青年，而是这个家那个家，则实不知是何居心？”

（吉力：《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2007年7月9日第1版。）这些话虽然尖锐了一些，但确实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里，我们应该思考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坚持斯大林模式、走苏联发展道路而得来的，还是因为摆脱了苏联的那一套而获得的？毛泽东曾说：“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现在我们应该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实事求是地看，当今的俄罗斯对斯大林并非一边倒地赞扬，如何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仍是人们争论的核心。褒扬者认为斯大林模式让苏联成为工业国，使苏联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并成为世界强国。贬斥者认为斯大林让社会和人民付出的代价过大。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意味着稳定和秩序，有人看到的则是镇压和恐怖。有人赞扬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有人则称之为暴君和独裁者。总之，在现今的俄罗斯，人们对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本人的评价，仍然存在巨大差异。2009年12月3日，普京在回答网民的提问时也坦率地承认，对斯大林的活动“无法作出总体评价”。他说：“你肯定，一些人将会不满意，你否定，另一些人则会不满意。”普京认为：“显然，从1924年起至1953年，那时由斯大林领导的国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我们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 任何人现在都不应该诽谤那些组织和领导这场胜利的人，因为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后果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将更为惨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普京也强调，这些成绩“是以不可接受的代价获得的。不管怎样，发生了镇压的情况，这是事实。我们数百万同胞遭到了镇压。这样的管理国家和取得成就的方式是不能接受的。这样做是不可以的。毫无疑问，在这段时期里我们遇到了不单单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对自己人民的大规模违法行为。这也是事实。对此我们也不应忘记。”2009年10月30日，梅德韦杰夫在总统博客中，对斯大林的政治镇压发表了评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涉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有人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的目的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 是错误的，因为国家的发展和

进步没有理由以民众的痛苦与伤亡为代价。任何事物的价值都不能置于人的生命之上。不能假恢复历史公正之名，为斯大林制造的大清洗开脱。”2010年5月7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访谈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他还驳斥了有关“斯大林主义正在苏联死灰复燃的看法”。在为弘扬俄罗斯大国地位、强调苏联在对德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庆祝二战胜利65周年的活动期间，俄罗斯领导也一再谴责斯大林犯下的“永远不可饶恕的罪行”。梅德韦杰夫还非常明确地说，自新的俄罗斯产生以来，国家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非常明确。他还说，俄罗斯每个人都有权利对斯大林作出自己的评价，但“这种评价不应影响到国家评价”。本书作者认为，不能把斯大林时期造成的惊人的大量非正常死亡，说成与斯大林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是瑕不掩瑜”的。推动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发展，不能用千百万人的尸体铺路，不能用头盖骨做酒杯喝下人类文明的美酒，如果这样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丑化社会主义的形象，让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恐惧感，使世界广大人民群众远离社会主义。

斯大林举全国之力，不顾农民的死活搞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领导人民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被这些成就和胜利冲昏了头脑，开始把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并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苏联模式。1948年5月，斯大林在致铁托和南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英）斯蒂芬·克利索德编，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南苏关系1939-1973》，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页。其后，在苏联的指使下，在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展开了对所谓“铁托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的领导人普遍受到镇压和迫害。二战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照搬了苏联模式。战后各国的实践证明，斯大林模式不能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这种封闭式、靠行政命令建立和运转的体制模式，拉大了这些国家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导致了落后。苏联的实践表明，如果想按照少数人的意志，滥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去搞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根基就不可能牢靠。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体制有所改革和改良，经济有新的发展、民主也有些许扩大，但没有打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这正是苏共丧权、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瓦解、苏联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

第三，要正确认识苏联与中国的关系，努力消除苏联对中国的不良影响。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涉及中苏两国的关系，二是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中苏两国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苏联共产党曾经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给予巨大的援助，我们是真诚感谢的。但中国也是沙俄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受害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此曾进行过长期的、艰苦的抗争。今天俄罗斯人从强国主义出发说了斯大林不少好话，我们中国人对此应保持清醒，不要人云亦云。

斯大林确实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斯大林建设的强国是以牺牲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中国也是受害者之一。邓小平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说过，沙俄是侵害中国权益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一定意义上也包括苏联时期。许多事实可以验证邓小平的说法。黑瞎子岛是被斯大林于1929年占去的。苏联与张学良东北军因中东路发生战争，苏联红军取得胜利，让日本人看到东北军战斗力弱，使他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大规模侵略中国。在卫国战争前苏联利用新疆的盛世才，在新疆驻兵开矿，卫国战争开始后他们才不得不把目光从新疆移开。失去盛世才这个控制新疆的工具以后，1944年苏联出兵伊犁、塔城和阿尔泰地区，帮助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这个所谓共和国宣布从中国分裂出去。现在的“东突”分裂势力仍把当年的“东土耳其斯坦”视为自己的历史渊源。1944年苏联还乘中国忙于抗日战争而苏德战争出现转折之机占领了唐努乌梁海地区（现在俄罗斯联邦的图瓦共和国）。1945年二战胜利之际，斯大林利用中国国民政府有求于他，又进一步把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斯大林使中国失去的领土面积已经超过沙皇政府。苏联利用出兵中国东北之机，恢复了沙俄在中国失去的权益，斯大林在1945年9月2日《告人民书》中骄傲地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苏联红军在东北拆走那里厂矿的设备，把本来卖给日本人的中长铁路又变成了中苏共管，把旅顺港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租期长达30年。新中国建立后，斯大林仍然不愿放弃他在中国取得的权益，极不情愿废除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协定。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斯大林不得不对中方作出让步，重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大连港的协定。面对即将失去在中国的权益，为了实现其远东战略利益，斯大林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支持金日成统一，并把中国拖入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离开安理会，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提供方便，斯大林在向哥特瓦尔德解释此事时说：“如果美国政府今后继续陷在远东，并把中国拖入到为朝鲜的自由和自身的独立而进行的战斗。结果会怎样呢？首先，美国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不可能战胜拥有大量武装力量的中国。也许美国会在这一斗争中受些损伤。第二，在这件事情上受损伤的美国就没有力量在最近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也许第三次世界大战会无限期地拖延，这就为欧洲社会主义的巩固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与中国的斗争将会使整个远东革命化了。这从世界力量平衡的角度看是否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有利。”斯大林的用意昭然若揭，苏联也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

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角度看，中国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形象地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中国共产党人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苏联学来的，更具体地说是受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在政治方面，我们正是在学习苏联的情况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在经济方面，我们不仅接受了苏联巨大的援助，更把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照搬照用。在文化方面，苏联文化和文学曾经影响几代中国人，许多已经被俄国人淡忘的



苏联歌曲几乎成为中国的民歌。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此等等。

毛泽东对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说过多少好话。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团谈话时毛泽东说，苏联对他不信任，怀疑他是半个铁托，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才给他摘掉这个帽子，“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253页。）毛泽东表示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文章，“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头上发号施令”。他虽然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大多是政治需要，“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页。）针对苏共二十大，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吴冷西著：《十年论战》（上），第260页。）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得不够彻底，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在1958年7月22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表示了对斯大林强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不满，他说：“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成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5页。）“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1-332页。）这些先于《九评》的言论，显然更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毛泽东也看到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没有解决好。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们发现斯大林模式带有严重的弊端，并不符合中国这个农民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也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



潮流相悖，不能激发人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不要苏联特色，就是“去苏联化”。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针对苏联即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而言的，中国特色首先是不带苏联特色，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我在多种场合提出，要想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与活力，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去苏联化”，抛弃这一模式。我认为，经过 30 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在“去苏联化”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人想把中国特色拉入苏联模式之中，把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认为是偏离苏联模式的结果。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巨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本身就说明：它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就是“去苏联模式化”，即革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问题如果不联系中国的改革，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把斯大林模式看成是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对其观点和体制加以否定和改革，就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意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走上苏东剧变的道路。”这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历史告诉我们，正是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没有重蹈苏东国家的覆辙。

第五，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光荣的任务。

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思潮、观点是正常的现象。主要是三种社会思潮，即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三种思潮、理论各有其社会基础和社会势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非主流的思潮和势力都力图从不同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和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左”的思潮把高度集权、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宗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成是搞市场经济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则鼓吹全面的私有化和彻底的市场化（即“市场万能”），力图使中国离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防止两极分化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原则。所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清醒地排除“左”的和右的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看待苏联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的一次历史性试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西方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更不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在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我们不照搬别人的模式，但不意味着不吸取别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善于利用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苏东剧变后许多国家照搬西方模式，以为这样可以一步登天，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表明，这只是梦想，现在他们也都在吸取

教训，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同样，我们也不能离开国情，割断历史。我们不能用中国今天的全套理论、做法机械地评判苏联模式的是非对错，但中国 30 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经验理所当然地也给我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深刻的启迪。我认为，离开发展人民民主，着力改善民生就谈不上建设社会主义；离开平等、尊重人权、社会的公平正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社会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中国正处于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抛弃苏联模式的彻底程度，取决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创新。

我认为，那种把斯大林时期视人民生命如草芥的暴政轻描淡写，甚至视为正当行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中国吸取了斯大林时期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的执政教训，提出“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和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将永远坚持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念。

## 第六，如何看待苏联共产党的问题。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认为，主要应该是党的问题，并引用邓小平同志 1992 年著名的南方讲话，即“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加以论证。邓小平同志的话并不错，但他们把问题集中到“党的问题”上，归结到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放弃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值得讨论。

苏共是执政党，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状况自然对苏联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但要指出的是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从制度层面去分析邓小平同志上述的论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不从制度层面去分析党的问题，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苏共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弊端，如高度集权、缺乏民主与有效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思想僵化、脱离群众、破坏法制、个人崇拜和特权盛行、“在册权贵”的形成、不断出现政策失误等等，是由什么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些严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产生后又由这种制度保证上述弊端的长期存在并发展。因此当斯大林模式被抛弃时，必然也抛弃了由这种制度模式保证其生存的苏共。有人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有着将近 2000 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 74 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共产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的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的记载。”遗憾的是，提出问题的人并没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简单地说，那就是因为广大党员与人民对苏共以及由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已出现了信任危机。可以说，是人民抛弃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思想与人民利益的苏共。这也充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一个真谛，那就是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人民群众可以被蒙蔽一时，但不能长久被蒙蔽。制度的好坏，应该以人民能否接受为标准。

苏共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没有解决领导国家的方式方法问题，长期党政不分、党国不分。斯大林把苏维埃降到一般群众组织的地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苏维埃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国家的重大决策不是在苏维埃，而是在总书记个人的小圈子里决定的。俄国是个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党代表人们管理国家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执政后的苏共一个重要使命应该是教会人们运用社会主义民主，实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人。实际上苏共并没有做这一工作，而是长期垄断权力，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总结的：“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共产主义”专访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南风窗》2009年第24期，第33页。）苏联剧变正是这样发生的。

苏共自身也没有加强民主建设，仍保持着在国内战争时期形成的体制，党的最高领袖是绝对权威。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由组织部门任命，没有选举制和任期制，上至总书记，下至各级第一书记实际上掌握着大权，处于不受监督和制约的地位。党的各级干部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党群关系紧张。由于缺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苏共走上了代表各级官员利益而不是群众利益之路，干部按级别不同享受着不同的特权，他们自己有专门的医院、商店、疗养院、住宅、别墅，以权谋私、贪污腐化成风，他们看不到老百姓生活的困苦和不便。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闻》报道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民意测验。调查表明，大约半数的苏联人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社会正义的社会”中，人们对高级官员享有特权的制度表现出最强烈的不满。按照人们对各种特权不满程度排列，它们分别是：在内部商店选购食物和用品、免费提供影剧院等场所的座位和各种书籍、在受人尊敬的住宅区的高级住房中拥有公寓，以及国家提供别墅等。列宁说过，执政党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苏联的老百姓长期忍受生活用品短缺之苦，许多人都没有单独的住宅，这种巨大的反差造成了人们对苏共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并不能代表自己。

有人在引用邓小平同志“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论证苏联剧变根本原因时，实际上主要归咎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且不说这种说法严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就这两个人而言，他们身上确实有许多缺点，缺乏驾驭全局的能力。赫鲁晓夫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的框框，丧失了苏联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机。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失控与最后失败，加速了苏联的剧变。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恰恰是苏联体制的产物，是苏共缺少选贤任能机制的产物。

我们党十六大、十七大先后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员是党组织的主体，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这不是老话、套

话，这里包含着对苏共执政教训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多年来我国广大理论工作者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提出来与读者共同思考。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参加本书撰写的作者较多，既有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也有年轻之秀。他们绝大多数是长期从事苏联有关领域研究的资深学者，一辈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苏联问题。他们运用了许多新资料，也包括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进行研究，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研究历史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未来。本书反映了我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很多新成果，力图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值得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级干部、学生和研究这一问题 的专家学者重视和阅读。希望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李凤林同志曾任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苏联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1)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键盘左右键（← →）可以翻页

[全屏阅读](#) [加入书签](#)

世界多数国家的权力交接都有一个明确的制度。多数现代国家通过选举推选出国家的领导人，一些王国通行王位继承制度，一些国家实行由前任指定接班人制度，一些国家通过政变来解决国家的最高权力问题。那么共产党领导的苏联的最高权力是怎样交接的呢？

列宁没有制定权力交接机制

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 20 世纪 20 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

1921 年底 1922 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 1922 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列宁当政时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很年轻，列宁本人逝世时也才 54 岁。所以那时并没有制定一个权力交接的制度，甚至没有确定党内最高职务。列宁在

党内是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党外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领袖地位是由他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自然而然地形成，被全党所默认为的。在列宁所担任的职务中哪一个 是关键的领导位置，那时并不明确。列宁因故未能出席政治局会议时，主持会议的是加米涅夫。列宁去世后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是李可夫，但很难说他们中哪一个 是列宁的接班人。

1922 年 12 月底，列宁写了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其中对 6 位党的领导人提出自己的看法，既指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也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这 6 人应当是列宁优先考虑的继任者。这 6 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在这 6 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党的十三大上，当时掌握 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代表团中分别口头传达，代表们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长期流行一种说法，1922 年党的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许还有斯大林本人在底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见本书（15）《斯大林是怎样一步一步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一文）。

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 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主编”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

第三，1923 年 1 月 4 日，在《对 1922 年 12 月 24 日一信的补充》中列宁明确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3 卷，第 340 页）。两个月 后，1923 年 3 月 5 日列宁又致信斯大林，要同他断绝关系（《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52 卷，第 555 页）。由此可见，有一点是清楚的，列宁已经明确无误地 把斯大林排除出接班的行列。

斯维尔德洛夫逝世后，列宁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够接替他的只能是一个集体。对接替列宁来说，当时更没有一个人具有此能力和威望，能取代的只能是一个集体。看来，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 6 名中央委员进行评论，目的就在于此。

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作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虚情假意地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假意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作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托洛茨基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作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

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因为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看来，争夺最高领导权的唯一对手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右派”。这样，通过残酷的党内斗争，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领导地位。

###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24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他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斯大林就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7-178页）。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 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 40 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 30 来岁和 20 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波利斯·巴让诺夫著，洪刚译：《斯大林秘书回忆录》，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 页。）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 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 6 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 年列宁本人 52 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 1879 年，（有一个说法，斯大林生于 1878 年。如果是这样，除列宁外斯大林就是当时领导班子中年龄最大的了）都是 43 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 1883 年，为 39 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 1888 年，34 岁，皮达可夫生于 1890 年，32 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 6 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是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斯大林掌权到卫国战争胜利后，到 60 多岁的时候，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 年 6 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阿·阿法纳西耶夫：《“列宁格勒案件”真相》，见万启智等编译：《克里姆林宫秘闻》，新华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6 页。）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 年），1937 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 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 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 年），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 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 年先后任



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 1946 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 1949 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 1950 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 30 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罗·麦德维杰夫、若·麦德维杰夫著，邹子婴译：《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0、12 页。）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 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 10 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排名第五的赫鲁晓夫过不了多久就能够把排名第一的马林科夫排挤出中央书记处，而马林科夫竟然接受，这说明当时确实不清楚，到底什么职务是关键性的接班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前担任的职务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领导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

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 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 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 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到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 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 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 鲁晓夫终于在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须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安德罗波夫接班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勃 列日涅夫执政 18 年。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连任下去而不挪窝。勃列日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实际上已经无力视事，他本 人也曾有退意。1979 年 4 月勃列日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他非常累了，打算退休。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地表示反对，并保证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能够继续富有成果地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因为这个病 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不倒，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周围。并且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忘记斯大林的花招斯大林多次宣布辞去全部党政职务，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谁能保证勃列日涅夫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没有人敢冒险！

勃列日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回忆录中说，1976 年间勃列日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格里戈里·罗曼诺夫，认为此人是 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如果他再多学一点，完全可以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但此后有传言说，他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 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罗曼诺夫的官运就此结束。1980 年 5 月，勃列日涅夫赏识的已经是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契尔年科。

乌克兰共产党首脑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一。有一次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的成绩，博得勃列日涅夫欢心，于是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已的圈椅说：“沃洛 佳，我走后你就来坐这个位置。”（《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28 页。）这个说法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伊万·卡皮托诺 夫的证实。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曾同他谈过话，谈话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已的坐椅说：看到这张坐椅了吗？过几个月谢尔比茨基将坐在上面。所有的干部问题 都要据此安排。

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有人在。苏斯洛夫去世后，葛罗米柯就想接替苏斯洛夫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一旦成功，接班就有望了。但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都认为应当由安德罗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

安德罗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任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所以他在 1967 年获得重要任命，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安利用这个位置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据说曾多次策划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

当时，契尔年科同安德罗波夫竞争得非常激烈，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之后，契尔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直到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径直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局面。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党内元老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在“小圈子”内碰过了头，决定让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会议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表决通过。

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罗波夫的命运。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即使中央委员们也没有发言权，摆在政治局委员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异议的现成方案，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这从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班人的最后敲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元老选择了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

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

安德罗波夫虽然能干，并且想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惜他上台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天不假以时日，执政一年多就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生前是属意戈尔巴乔夫接替他的。1983 年 6 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安德罗波夫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的报告不满意，休息后直接让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据说，安德罗波夫曾准备另一个在 1983 年底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说：

“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0 页。）

这段话在分发给会议参加者的文件中不见了。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样的插曲，不会事出无因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几个人有可能接班：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认为 75 岁的乌斯季诺夫最为合适。而安德罗波夫曾属意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也认为戈尔巴乔夫最合适。然而总书记刚刚逝世，党内元老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内碰头商量。这是没有记录的会商，商量的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连当时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不过碰头后，耳背的吉洪诺夫在走廊上大嗓门的话却让许多人听到了：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引者注）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契尔年科 引者注）嘛，正好合适。”

接着的选举就是例行公事了。契尔年科宣布开会，吉洪诺夫先谈形势和党的任务，最后提议选举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接替安德罗波夫管理这个大党大国的，又是一个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病夫！

总书记的葬礼完毕后，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看望安德罗波夫的夫人，后者高声哭诉道：“为什么要选举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安德罗波夫 引者注）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引者注）啊。”（《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284 页。）

由此可见，前任总书记并没有，而且也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即使他有自己属意的人。这一次又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各种权力平衡的结果是抬出一个老朽的领袖来。

1984 年 2 月 14 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契尔年科以新的身份讲话，正式接任了第一把手的职务，但到年底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作出正式决定由谁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临到要开会了，通知说总书记不能来了，由戈尔巴乔夫代为主持会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85 年 3 月 10 日契尔年科去世。

### 戈尔巴乔夫出山是“众望所归”

契尔年科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总书记。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由治丧委员会主席担任未来的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实际上他需要赢得多数的支持，这样他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尽管还有人觊觎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接连死去三位总书记的可悲现实，使得高层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得到一致的支持。葛罗米柯率先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同意。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受政治局的委托提议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得到全会的表决通过。十来年的老人、病夫治国，3 年死去 3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人，54 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顺便说一下，列宁正是在 54 岁逝世的！

戈尔巴乔夫本人评论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峰。（《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 302 页。）

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执政 74 年，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规范、民主、有序的正常的最高权力交接班制度，其接班人选是在上一届领导人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决定，有时甚至是通过党内政变解决的。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郑异凡）

苏联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

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1898 年成立时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 年改名俄国共产党（布），1925 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简称联共（布），1952 年改名苏联共产党。为便于行文，本文不分时期一律称为苏联共产党（苏共））早期是列宁缔造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它领导俄国人民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创建了苏维埃国家。在尔后的 74 年里，它历经各种风雨，把苏联建成世界超级强国之一，却经不起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顷刻自行解散。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现在笔者从苏共自成立至结束的历史演变，阐述它后来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党了，对其自行解散作一历史诠释。

以夺取政权为目的，而不随情势变化进行自身的变革

毛泽东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以后的任务更艰巨。苏共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确实为圆俄国的富强之梦做了很多事情，唯独忘了自身的变革，后来变成了以控制政权为唯一目的，不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政党和国家，无论从含义和职能来说，都是不同的范畴，国家是随着阶级的产生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建立的；而政党则是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参政意识的增强而形成的政治团体。国家以行政力量将社会矛盾和冲突限制在特定的秩序范围之内；政党的重要职能是在政权机关里表现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和意志。执政党则是代表社会来行使国家权力。苏共自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至自行解散，始终以党代政、党政合一，是背离政治文明发展的自然趋势的。苏共不思自身变革，以掌握政权为唯一目的，是和它实行以党代政、党政合一的方针分不开的。

现代社会的政党政治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从资产阶级创造典型的政党政治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政党政治的一般特点。

17 世纪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时并没有政党。1679 年 5 月，国会讨论王位继承人问题时，出现了分别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集团，到 19 世纪 40 年代，演变成相对稳定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到 20 世纪初，又演变成工党和保守党的国会两党制。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尔后，经过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等近一个世纪的政权更迭和政坛纷争，到 1875 年“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后，国民议会才形成相对稳定的多党制政党政治。

美国的政党政治也是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在国家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19 世纪 20 年代，国会中形成反映南部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和代表西部农业资本家、北方工商业者利益的共和党。南北战争后，由于奴隶制被法律所禁止，民主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又有了变化。

如果撇开具体的英国君主立宪制、美国联邦制、法国共和制等不同政体，也不管英、美的两党制和法国的多党制，就典型的现代政党政治的发育过程来看，都是：（1）先立国、制宪，后建党，各政党都在宪法的规范内通过公平竞争来建立和活动；（2）政党是相对稳定的某一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阶级、阶层的重构，政党的名称、组织也有所变化；（3）某一政党一旦上台成为执政党，就不能忽略全社会的普遍利益。这些，可以说是现代政党政治的要素。现代政党政治对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在于，有利于实现权力的制衡性、决策的民主性、竞争的公平性、利益的协调性、秩序的法制性。这几乎被世界各国所认同。

苏共成立于 1898 年，当时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的目的在列宁看来首先就是夺取政权。20 世纪初，列宁明确地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1 卷，第 406 页。）由于在建党目的、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上的分歧，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形成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派，它将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完全集中到夺取政权上来，终于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苏共随之成为国家的执政党。1918 年，苏共又凭借掌握的国家政权，以暴力取缔了除苏共以外的一切政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政党。苏共以暴力实现一党专政的措施和现实，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成为日后党权即政权、党即国家的观念氛围和客观环境。自此，苏共始终以国家和宪法的缔造者自居，凌驾于国家和宪法之上。

1924 年 1 月，列宁在久病之后逝世。如果说列宁在当政时期尚没有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作为国家执政党以后的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的话，那么，斯大林当政近 30 年，已有足够的时间、条件和精力来考虑和调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斯大林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提出“随我们的进展，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的理论（见《斯大林全集》第 11

卷，149 150 页），使阶级斗争常态化，不断开展各种政治运动和“大清洗”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禁止思想自由和自由地思想。

1953 年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之。赫鲁晓夫从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关于党的问题，赫鲁晓夫在 1961 年 10 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全民国家”、“全民民主”、“全体人民的党”等概念的思想（见《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75 页）。赫鲁晓夫的改革，使“以野蛮的手段消灭俄国的野蛮”这种俄国文明发展进程的传统出现转折，开创以文明手段推进俄国文明的先肇。关于党的改革的思想观念和观念，尽管还不明确、不科学，但它表明赫鲁晓夫希望改革苏共，因为这个党作为国家执政党已有 45 年了，而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活动策略却丝毫不改夺取政权时期的那种状况。1964 年 10 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虽然表示要贯彻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实际上停止了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全面回归到斯大林时期去。刚刚开始提出、尚未有实际行动的关于变革党的问题，也被闷死了。

纵观苏共 93 年的历史，从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变为苏联国家执政党；在这 93 年里，世界和苏联社会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苏共却抱着最初的东西，拒绝变革。

苏共不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

早期的苏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和意志的体现者。但是随着它成为执政党以后，就逐渐变了。

斯大林时期，苏共无视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工人的工资和级别是国家规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沙皇时期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工人的居住条件更差，多数是一家老少蜷缩在一间斗室里。斯大林把各级苏维埃变成橡皮图章，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的嘲弄。工人挨不到企业生产和管理的边，和口头、文字上铺天盖地的“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的宣传，形成黑白分明的对照。

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的情况更惨。农业集体化是对全体农民的剥夺，稍有不满意的行动，即被作为“富农”，没收财产，或被流放，或被关进集中营。随之，农民被迫接受“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用斯大林的书面语言来说，是“为国家工业化缴纳贡税”。农民被死死地钉在集体农庄里，实际上是把全体农民变成苏共领导层的准国家农奴。苏共内部以布哈林为首的部分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政策措施提出不同意见，斯大林即恨之入骨，被作为“党内右倾复辟资本主义”集团横遭批判，直至被作为“帝国主义间谍”，惨遭杀害。

即使是受斯大林看重的社会名人，也只许颂扬集体化，不许讲真话。1931 1933 年，著名作家肖洛霍夫深入苏联传统产粮区顿河地区农村去体验生活。肖洛霍夫看到集体农庄的收获几乎被国家征光了；征粮队像对待囚犯那样对待农庄庄员；农村到处出现挨饿现象，不少地方大批饿死人；生产管理糟糕得难以想



象。肖洛霍夫把这些触目惊心的情况，多次写信向斯大林汇报，希望能得到纠正。1933年4月16日，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仅仅在韦申斯卡亚区（北高加索）有2000户农户因没有完成交粮指标，就被开除出集体农庄，随后被没收财产，连种蔬菜的地也被没收，这些家庭只好等着饿死。征粮队挨家搜查粮食，“法院把从其它旁地搜出粮食的人判了10年徒刑。仅韦申斯卡亚区因粮食问题被判刑的就有1700人左右。他们的家人随即被迁往北方。”（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肖洛霍夫请求斯大林向韦申斯卡亚区和上顿河区提供救济粮，因为农民都在挨饿。

1933年5月6日，斯大林回复肖洛霍夫，训斥说：“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您的信不是小说，而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应当全面地看问题。您所在的区（也不光是您所在的区）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消极对抗！），他们才不在乎工人和红军是不是在挨饿，消极对抗是无声进行的，从表面上看是不伤人的（不流血），但是这一事实并不会使下列事实得到改变：令人尊敬的庄稼人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殊死的战争，亲爱的肖洛霍夫同志。令人尊敬的庄稼人也并非真是不伤人的，时间越长会看得越清楚。”（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696页。）斯大林就是这样看待、对待农民的！

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十分不幸。很多卓越的科学家被无辜剥夺自由，关在集中营里从事科学研究。遗传学和遗传学家的遭遇，是苏共对待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缩影。斯大林宣布遗传学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禁止研究，解散研究机构，查封研究书刊。享有国际盛誉的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诬为“帝国主义间谍”，受迫害死于狱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再次掀起讨伐遗传学和迫害遗传学家的新高潮，摧毁遗传学研究。

尤其令苏联全国和全世界震惊的是，斯大林在当政的近30年里，没有停止过“大清洗”、大镇压运动，制造了数不胜数、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据1988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仅有案可查的就达2578575起，莫须有“案件”，涉及3778234人，其中786098人被处死。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被冤枉的人中，有2478406人，即占含冤人总数的65%以上是由非执法机关处理的，其中656548人，即占被处决人数的83.8%，是被非执法机关枪决的。（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4-625页。）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案件”，还不包括农业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民族迫迁运动中受镇压、被处决的无辜者；也不包括秘密集体屠杀已被解除武装、被羁押在战俘营中的21857名波兰官兵，并且这仅仅是到1988年为止所查明的数字，最终数字至今未明。

搞阶级斗争，几乎是斯大林的终生职业；整人几乎是苏共的日常重要工作之一。这样概括斯大林和苏共，也许并不过分。

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苏共成立之初，有意创立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造福桑梓。但是当苏共完全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种种条件之后，它已不再代表先进生产力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掀起，经济全球化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由此，引起生产管理、观念、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深刻变化。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多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提出关于发展苏联科学技术、促进社会全面前进的方案和建议。可是，这些方案和建议被锁入保密柜不见天日。

此时，苏联已建立半个多世纪了，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政局比较稳定，某些科学技术，尤其在某些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还领先于美国。人类社会的第一、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贡献，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在两种社会制度激烈竞争的年代掀起的。此时的苏联已完全具备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有所作为的条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把聚敛起来的财富、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用于发展以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生产，与美国展开核军备竞赛，推行名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新“世界革命”战略。20 世纪 80 年代初，苏联坦克的年产量是美国的 4.5 倍，大炮年产量是美国的 9 倍，核潜艇年下水量是美国的 3 倍。在国防工业部门工作的员工，美国约 220 万，苏联是 500 万 800 万。勃列日涅夫在核竞赛和争霸世界中确实取得成绩，达到俄国有史以来的鼎盛，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美国。但是，国内人民生活质量却基本上原地踏步，生产管理及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国家经济状况连年下滑。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甚至某些原来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借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势，强劲地发展和崛起了。1970 年，苏联在煤、焦炭、拖拉机、水泥的生产水平方面都超过美国，铁矿石的采掘量是美国的 6 倍，可是日用消费品生产只有美国的 1/6。战后时期，苏联的科研人员是美国的 2 倍，而苏联科学家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只相当于美国的 1/14。许多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难以在苏联从事研究和创造，纷纷移居国外。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落伍，证明苏共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相比之下，本来就已庞大得吓人的官僚队伍则更加膨胀起来。仅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各机关，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机关，这些机关的干部就达到 50 万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赶紧把赫鲁晓夫规定、尚未切实实行的领导干部、苏共中央委员的任期制、轮换制予以废除。于是，自 1965 至 1984 年，高层党政机关干部层几近凝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数的任期超过 15 年，中央委员大多数任期超过 12 年，其中像波诺马廖夫已有 34 年，齐米亚宁已有 25 年。1981 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超过 70 岁。政治局会议一般是 15 分钟左右；勃列日涅夫连读几分钟读秘书准备好的讲话稿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党员数字虽然已达 1500 万，但党员和党的决策毫不相干。党代表大会是一种装饰，代表们发言的内容实际只有两条：一是汇报自己的工作，二是颂扬以“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勃列日涅夫同志为首的政治局。

由于苏共已是个只要权力、不要活力的政党，因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只是被用于装饰，而被教条主义化和实用主义化了。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早被苏共用做打人的棍子、束缚人的思想的绳索。茹拉夫廖夫主编的《俄国史 苏维埃社会》称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是“对任何

变动，无论是向右或向左，向前或向后，都怕得要命的套中人。在任何政治气候中都穿着斯大林官员传统的外套、帽子和胶皮套鞋。这位聪明的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常胜者不无理由地担心：斯大林建立的军事动员制度，尽管其结构强暴而残忍（也许正因为如此），但不能做任何重大的改革。因为其中任何构件的改变，尤其是重心的转移，设想一下，把金字塔翻过来，都有使这一制度完全毁灭的危险”。毫不奇怪，在现已解密的堆积如山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未见一纸关于他们自己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文字记载。

写到这里，应该对本文的主题，即苏共是个什么样的党，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了。

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在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斯大林文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5页。）苏共不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利益；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一切为了政权，拒绝自身的变革。苏共在它存在的历史中，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坚持一党专政。从它成为执政党之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一党专政与实行干部委派制、领导职务终身制、以党代政制之间，很难分辨哪方面是因，哪方面是果。也许，它们之间都是斯大林模式的有机统一，就如苏斯洛夫所说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党，可以这样说：苏联共产党本来是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可是，在它夺取国家政权，成为国家唯一的执政党之后，拒绝自身的变革，已经逐渐演变成尚深受沙皇专制主义传统影响的苏联国家官僚特权阶层的政党，一个具有俄国特征的一现代国家官僚阶层的政党，尽管还叫做苏联共产党。

这样一个党，到20世纪末，在时代和改革浪潮的冲击下，一朝轰然倒塌，应是俄国文明发展的逻辑结果。（叶书宗）

苏共党内实行怎样的监督机制？

苏共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也面临着如何监督权力、防止官僚主义和权力滥用的问题。列宁重视监督工作，初步建

立了党内监督机制。列宁逝世后，苏共党内的监督机制越来越离开了原来的轨道，失去了监督作用。

### 列宁的监督思想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建立

对 权力进行监督是任何社会制度都必不可少的。列宁监督思想的核心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列宁最初设想通过人民对国家公务人员的选举与撤换实施监督，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提出“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把国家的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46页。）使国家行政管理人员从人民的“老爷”变成人民的“公仆”，使国家机关真正成为高效、廉价的为人民服务的机关，实现人民主权，实现人民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便广泛推行工人监督。列宁也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1918年5月成立了专门实施监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这一部门当时的职责是监督、检查国家机关对决议和命令、计划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其工作作风。但是，这一机关并没有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了中央申诉局和地方分局。1920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列宁想让工农群众监督国家机关，检查国家机关的工作，学会自己管理。

但是，无论是群众直接选举领导人，还是直接监督国家机关，都没有真正实现，列宁对此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55页。）党代表人民成了国家的管理者，工农群众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因此，列宁转而注意在体制上保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1920年9月，苏俄开始转入和平建设，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建立监督、检查制度的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有必要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应当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监督的同志组成。党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监察委员会应当有权接受和协同中央委员会审理一切控诉，必要时可以同中央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的代表大会。”（《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3—44页。）俄共（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则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组织局，只是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列宁把中央监察委员会置于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地位，由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足见列宁对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与作用的重视。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其任务是：“同侵入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升官发财思想，同党员滥用自己在党内和苏维埃中的职权的行为，同破坏党内的同志关系、散布毫无根据的侮辱党或个别党员的谣言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破坏党的统一和威信的流言蜚语的现象作斗争。”（《苏

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70页。）中央、区域和省的监察委员会分别由全国代表大会、区域代表会议和省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不得兼任党委会委员，也不得兼任负责的行政职务。监察委员会与党的委员会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同级党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委委员有权出席同级党委会和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切会议以及同级党组织的其他各种会议，并有发言权。对于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的委员会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销。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联席会议解决，解决不了的，可以提交代表大会或同级代表会议解决。这标志着俄共（布）党内独立监察制度的正式建立。1922年3月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监察委员会的任务和目的》的决议，重申了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督权的各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制。

随着独立的党内监督机制的建立，列宁进一步在理论上完善其监督思想。他在晚年所写的一系列书信和文章中，列宁反复强调建立可靠的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列宁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提高监察委员的素质、扩大其权限，“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 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也像一般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因为他们也应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4页），“凡与政治局会议有关的文件，一律应在会议前24小时送交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各委员，刻不容缓的事情除外，这类事情要通过特别程序通知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并加以解决”。（《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6页。）“有一定的人数必须出席政治局每次会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们，应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77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经常检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同时他们应当恰当地分配自己做检查工作的时间，以便对我们的机关（从最小的分支机关到最高的国家机关）的办文制度进行检查。最后，他们的工作范围包括研究理论，即研究如何组织他们将要去做的工作的理论，也包括在老同志或劳动组织高级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进行的实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384 385页。）列宁要求改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查院，使之能够真正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列宁建议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即成立二者的联合机关，统一行使监察职能，以提高工农检查院的威信，把其人数从12000人减至300 400人，这些人应该是熟悉业务的专家，其工作人员要通过有关考试选拔，他们应该不顾情面地进行检查，给检查员以较高的报酬。

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列宁所要建立的是独立行使监察职能的党内监督机制，其监督的主要对象是党员干部，包括最高领导，主要任务是防止官僚主义和滥用权力，防止决策失误。

#### 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削弱

1923年4月俄共（布）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没有列宁参加的代表大会。大会没有忠实执行列宁的主张，会议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至50人，加强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合作，但

把监察工作的目的确定为，“应该是弄清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实际成绩或缺点，确定该部门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盗窃方法并找出防止的措施，而不要偏重于搜寻个别的盗窃和舞弊行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就是从各方面保证党的路线能在所有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中得到贯彻”。（《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296、299页。）这次大会还作出了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才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应是相当于中央委员一般的党的工作者的决议。实际上没有采纳列宁关于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地位和职权的建议。

斯大林逐渐取消了监察的独立性，改变了监督工作的对象和职能。1924年5月俄共（布）十三大（这是列宁逝世后召开的首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数扩大到150人，其中许多是仍坚持生产的工人和农民，监察委员会的实际工作是“帮助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地方机关统一和纠正工会工作人员和经济工作人员的路线，同时完成建成工人专政的国家和巩固工农联盟的总任务”。（《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第434页。）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不是全体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只有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才可以出席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派代表三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三人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派代表五人（主席团委员）和副代表五人参加中央组织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中央、共和国、区（边区）、省和专区的监察委员会委员可以兼任党的委员会委员，兼任行政和经济部门的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古比雪夫的领导下，完全站在斯大林一边，在党内斗争激烈的联共（布）十四大上，古比雪夫表示中央监察委员会完全支持斯大林。1926年11月，奥尔忠尼启泽被斯大林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同时奥尔忠尼启泽还担任政治局候补委员，违反了中央监察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的规定，也不利于监察委员会行使监督权。

斯大林重新把国家和党的监察机关分开，1934年1月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联合机构，分别成立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把中央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联共（布）中央党监察委员会，由党代表大会选出委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为党监察委员会的领导者。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删掉了关于中央监察委员会一章，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委会制定有关政策的规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的执行；审理违反党纪的人；审理违反党的道德的人。中央监察委员会不再拥有对中央委员会行使监督的职能，实际上变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1939年1月党的十八大最终完成了对苏联监察体制的改造，规定党的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这样，经过斯大林的改造，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变成了各级党委的下属机构，其职能也从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和党的决策，变成了主要监督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其地位和作用大大降低了，对党的领导层，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起不到任何监督作用。与此同时，国家监察机关（1940年成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职责也主要是检查国家机关和合作社、企业对政府决议和命令的执行情况，而不是监察领导者的行为。监

察机关的领导人从选举制变成了委任制，其权力来源于上司而不是代表。斯大林滥用职权、搞“大清洗”、制造个人崇拜，与监督机制的萎缩不无关系。

### 60年代以来苏共党内监督制度的调整

苏共二十大后，苏共针对人民的不满，试图恢复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统一监督的原则，吸收广大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决定把党监察委员会改组为苏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其职能是审理对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区和州委关于开除党员和党内处分决定的上诉；成立党和国家统一的监察机关——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规定其任务是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苏共纲领，系统地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执行党和国家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赫鲁晓夫强调吸收人民群众参加监督工作，在企业、建筑队、集体农庄、车间等都成立了协助党和国家监察机关工作监督小组和监督岗。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督机关的地位、扩大了其职权，但是并没有实现列宁所强调的对中央决策机构的监督，也没有根本改变斯大林时期所形成的局面，人民群众仍然不能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赫鲁晓夫个人也仍然高居于党之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取消了赫鲁晓夫的上述改革，再次把党和国家的监督机构分开，他一方面把原来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名为“人民监督委员会”，另一方面重新建立从属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其职权仍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检查党和政府的指示的执行情况。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由中央全会选举产生。勃列日涅夫还取消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垂直领导，使地方监察委员会完全从属于当地党委，地方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也处于监督之外了。党的监督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仍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民众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领导苏联走出困境，在改革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监督机制建设。戈尔巴乔夫虽然强调任何一个党组织，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不能不受监督，但他行动迟缓，直到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才提出建立一个隶属于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的、统一的国家社会监督体系。会议决定成立苏共中央监察和检查委员会。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确定党的监督机构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察委员不得兼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或担任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监督苏共中央及其机构对民主原则的遵循情况，采取措施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压制批评、滥用职权等现象。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委员会的会议，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有权出席政治局及苏共中央其他执行机构的会议。戈尔巴乔夫似乎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是，此时苏共的威信已严重下降，地方分离主义兴起，苏共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迟到的苏共监督体制已经无法发挥任何作用了。1991年“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党的监督机制在制约高层领导的行为上，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 几点思考

从苏共党内监督机制的发展与演变中我们看到，苏共在长达 70 多年的执政时间里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切实有效的监督体制，党内的民主与监督机制对于高层领导的决策和行为基本发挥不了作用，这是苏共犯错误、走弯路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直接领导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因此，在党的监督机制不起作用的同时，国家监察体制也没有独立发挥过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看，苏联缺少民主的传统，个人的自主性、公民意识缺乏，他们更希望出现一位好皇帝，而不是自己对社会发展起主导和推动的作用。更主要的还在于主观方面，布尔什维克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机器的制度设计中，缺少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的意识和机制。

第一，最高领导人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列宁打算建立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接受监督的监察体制，但是，列宁没来得及把他的设想变成现实就病逝了，苏联的体制实际上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的领导风格与列宁不同，在掌握最高权力的过程中，斯大林强调的是集中、统一、纪律和服从，他把党看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强调党是意志的统一，他形象地把党看成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斯大林一再强调，“应当采取措施，使政治局各个委员和候补委员在会议上发言时不说出任何离开党的路线、离开中央和中央各机关的决议的话”，“应当采取措施，使党和苏维埃的机关刊物，无论是报纸或杂志，都完全执行党的路线和党的各个领导机关的决议”，“应当规定特别办法（直至取消中央委员资格和开除出党）来对付那些企图泄露党、党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的机密的人。”《斯大林全集》第 12 卷，第 96 页。他认为党内民主并不是让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的讨论，而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党的统一，加强党内自觉的无产阶级纪律”。（《斯大林选集》上卷，第 479 页。）在党内与斯大林意见不同的同志都受到了批判和处罚，失去了发言权。斯大林改变了党的政策的广泛的公开性，强调保密，广大党员干部失去了知情权和监督权。在 20 年代末，苏联形成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斯大林成了党的化身和国家的代表，监督机制对他不可能起作用。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虽然比斯大林重视监督机制的建设，但他们（包括戈尔巴乔夫）同样在思想上没有接受监督的意识，监督机制仍然是对下不对上，监督机制对于掌握实权的领导仍然不起作用。

第二，苏联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干部任命制度，是监督机制失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斯大林开始，中央监察委员会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其成员不再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监督者的权力都来源于领导者。这种被监督者领导着监督者来监察自己的体制，使监督者笼罩在被监督者的权势之下，监督机制无法发挥作用。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干部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逐渐成了特权阶层，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仅如此，监督机构本身也逐渐官僚化了，也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并没有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扩大他们的民主权利，公民的选举权实际上变成了无足轻重的投票权，公民无法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到苏联解体前夕，有 85% 的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的是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民众自然要抛弃这样的党。

第三，苏联单一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单一性，使苏联社会缺少监督的力量。从 20 年代末开始，斯大林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唯一的最高决策者，他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改变了党代表大会确定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以指令性计划为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加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活动空间，依靠国家生活，各级领导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不敢对之进行监督。正如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所说的那样，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在苏共包办一切的情况下，社会不存在任何批评机制，一旦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或领导人出了问题，就难以得到纠正。有人说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社会主义，搞垮了苏共和苏联，这恰恰是苏共缺少党内外监督机制带来的恶果。苏联共产党的教训是深刻的。（左凤荣）

UnRegistered